

中华经典藏书

文强译注

三国志



中华书局

中华经典藏书

文强译注

三国志



中华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三国志/文强译注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2007.4

(中华经典藏书)

ISBN 978-7-101-05564-1

I. 三… II. 文… III. ①中国-古代史-三国时代-纪
传体②三国志-译文③三国志-注释 IV. K236.0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034165号

-
- 书 名** 三国志
译 注 者 文 强
丛 书 名 中华经典藏书
责任编辑 刘胜利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)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- 印 刷**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 2007年4月北京第1版
2007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- 规 格** 开本/880×1230毫米 1/32
印张10% 插页2 字数150千字
- 印 数** 1-10000册
- 国际书号** ISBN 978-7-101-05564-1
- 定 价** 18.00元
-

前 言

《三国志》是记述东汉末年到西晋统一间这段历史的一部史学名著，它记述的主要是魏、蜀、吴三国的历史，故称《三国志》。《三国志》历来备受推崇，它与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合称前四史，而前四史被公认为是二十四史中成就最高的四部史书。《后汉书》的作者范晔是南朝刘宋人，成书时间晚于《三国志》一百多年，《三国志》实际是二十四史中紧承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的第三部史著。

《三国志》的作者是陈寿。陈寿字承祚，蜀汉巴西郡安汉县（今四川南充）人，生于蜀汉建兴十一年（233），卒于西晋元康七年（297），年六十五岁。陈寿从小好学，“聪慧敏识，属文富艳”，曾从蜀汉的著名史学家谯周学习，研读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等经史著作，尤精于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，这为他后来撰写《三国志》打下了很好的基础。蜀汉被灭后，陈寿以亡国之臣的身份入魏。他历仕蜀汉、曹魏、西晋三朝，曾任东观秘书郎、散骑黄门侍郎、著作郎、平阳侯相、治书侍御史等职，一生仕途坎坷，官位不显，所以《华阳国志·陈寿传》说：“位望不充其才，当时冤之。”

陈寿的著述很多，撰有《益部耆旧传》十篇、《古

国志》五十篇，又编纂《诸葛亮集》、《魏名臣奏事》、《汉名臣奏事》等书。吴平之后，陈寿始“鸠合三国史，著魏、吴、蜀三书六十五卷，号《三国志》”。《三国志》写成后，曾在士大夫间流传，立刻就得到了人们的认可，“时人称其善叙事，有良史之才”。当时人夏侯湛正在修《魏书》，见到陈寿的《三国志》，便将自己的书毁掉，不再继续撰写。朝廷重臣张华非常欣赏陈寿，认为他的史才要超过《史记》的作者司马迁和《汉书》的作者班固，准备将修《晋书》的事情托付给他。陈寿去世后，尚书郎范觐等人上书说：“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《三国志》，词多劝戒，明乎得失，有益风化。虽文艳不如相如，而质直过之，愿垂采纳。”于是晋惠帝下诏，令河南尹、洛阳令到陈寿家抄录《三国志》。《三国志》得到官方的认可，正式流传。

《三国志》之所以备受推崇，是因为它有许多突出的优点。

《三国志》六十五卷，其中《魏书》三十卷、《蜀书》十五卷、《吴书》二十卷，是一部纪传体史书。在陈寿之前，司马迁的《史记》贯穿古今，是第一部纪传体史书；班固的《汉书》，则是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。为同时并立的三国修史，是陈寿面对的新问题，于是他另辟蹊径，分作《魏书》、《蜀书》、《吴书》为三国各自修史，然后合为一书，总其名为《三国志》，非常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难题。这充分显示了陈寿的史才，同时也使《三国志》成为二十四史中别具一格的史书。

陈寿修《三国志》，眼光未局限于三国，而是上接汉末，为群雄董卓、袁绍、袁术、吕布等人立传。这是很有见地的做法，因为讲三国的历史离不开汉末的历史，离不开当时的这些风云人物，如果缺了汉末群雄在历史大舞台上的表演，轰轰烈烈的三国历史将会大为减色。陈寿虽分为魏、蜀、吴三国修史，但以《魏书》为主，即所谓以魏为正统。魏的君主依帝王例立本纪，蜀、吴的君主则降低一格，分别立传。另外，在遣词用字、人物的称谓上也体现出这种区别，如称魏君主为帝，蜀君主称先主、后主，吴则称吴主或径称其名等。以魏为正统，是陈寿颇受非议的地方，但这却是陈寿的无奈之举。陈寿修《三国志》是在吴平之后，大体上是当代人修当代史。西晋统治者司马氏是取代魏登上帝位的，只有承认魏的正统地位，才可以证明取代者司马氏的正统。而实际上从修史体例来说，他是将蜀、吴二国当做与魏并列的王朝来处理的，蜀、吴二国君主的传记，都是以本纪的规格来写，即以编年为序来记述传主的言行事迹，并以此为纲来记述一朝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方方面面的重大事件。其实这正说明了陈寿的苦心，由此说来，人们对他的这种非议是不足一驳的。

在《三国志》的撰写上，陈寿取材谨严，剪裁得当，坚持以求实的态度修史。陈寿修《三国志》，可供他选用参考的资料，有魏王沈的《魏书》、鱼豢的《魏略》，吴韦昭的《吴书》等，还有他自己掌握的蜀国资

料。他在史料的选用取舍上非常用心，皆再三审慎斟酌后才予采用。清代学者赵翼在批评陈寿的同时，也不得不承认他“剪裁斟酌处，亦自有下笔不苟者，参订他书而后知其矜慎也”，并列举大量例证说明他在资料使用上的剪裁得当。

《三国志》叙事生动简洁，语言洗练干净，评论中肯得当，毫无繁冗之词。也有学者认为《三国志》质朴有余，文采不足。当然，如果与《史记》那样的极品相比，《三国志》整体上的文采确是略逊一筹，然而在具体章节上，却不乏精彩的描写。比如赤壁之战，陈寿将相关史料分别放在《魏书·武帝纪》、《蜀书·先主传》、《蜀书·诸葛亮传》、《吴书·吴主传》、《吴书·周瑜传》、《吴书·鲁肃传》等几个纪传中，通过各有侧重的描写，把赤壁之战渲染得有声有色，尤其是其中吴蜀双方、各自的君臣之间的对话，非常传神。所以宋代大史学家司马光修《资治通鉴》时，对于这段历史，基本采用了《三国志》的记述，有些地方如《蜀书·诸葛亮传》所载诸葛亮与孙权的对话，几乎全文照录，这也从侧面证明了陈寿文字功夫的精到。又他在纪传后面的评论，不仅颇具文采，而且大都贴切公允，寓意深刻，堪称点睛之笔。比如我们看了陈寿对曹操精彩的评论，就会发现后人所谓的翻案，并没有太大的意义，陈寿对曹操早已作了非常恰当的评价。

《三国志》也有一些不足之处。

一是有纪传而无志。志是专门记载政治、经济、天文、地理、礼乐等典章制度的，它是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全面反映，是后人了解认识这一时期历史所凭依的资料。在《三国志》前边的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，都有这方面的内容。《三国志》无志，可能有社会动乱不已、资料不足等多种原因，但一部完整的纪传体史书无志，不能不说是一个大的缺憾。

一是叙述过于简略。《三国志》叙事简洁是它的优点，但对于史书来说，还是要给后人尽量多地留下有价值的资料。这一点陈寿做得有些不够，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传记资料很少，与传主的身份地位很不相称。如关羽、张飞、赵云，乃是蜀汉的开国元勋，而《蜀书·关羽传》仅一千二百余字，《蜀书·张飞传》仅八百余字，《蜀书·赵云传》仅四百余字。又如徐幹、陈琳、应瑒、阮瑀等建安时期的著名文人，皆未立专传，只附记在《魏书·王粲传》中，而且除记陈琳事有三四百言外，其余皆寥寥数语。这其中也有资料不足的原因，《蜀书·后主传》的评论说：“国不置史，注记无官，是以行事多遗，灾异靡书。”不设史官，当然记录下来的资料就不会太多。

一是对曹氏、司马氏等统治者隐恶溢美，曲笔回护。这是陈寿最受垢病的地方。中国的修史传统，讲究直书实录，不隐恶，不扬善，给后人留下信史。唐代史学家刘知己批评陈寿对司马氏篡权弑主事未置一词，不肯如实记录。清代学者赵翼《廿二史札

记》有“《三国志》多回护”一条，专论曲笔回护事。考之史实，这确实不是虚词。但所谓曲笔回护，是专制时代无法完全避免的。陈寿作为晋人，让他直指甚至揭露当朝者的丑恶行径是不现实的，有时甚至还要为他们粉饰，对他来说，这也是无奈之举。而实际上陈寿在对统治者有所回护的同时，也对他们作了一些隐讳的批评，如在《魏书·文帝纪》的评论中，他就对魏文帝的心胸狭隘进行了批评。而且同样是曲笔，要看是有意还是无奈，还要看程度的多少。考察《三国志》，毕竟直笔实录的多，曲笔回护的少，整体上是实录。

此外，还有人批评陈寿借修史谋取私利和发泄私愤，古今学者对此作了驳正，都是不足凭信的虚言。

《三国志》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是它的注。陈寿去世一百多年后，随着有关三国的史料的逐渐出现，南朝宋文帝刘义隆认为《三国志》过于简略，命时任中书侍郎的裴松之为之作注。裴松之字世期，河东郡闻喜县（今山西闻喜）人，在他的祖父时，裴家迁居江南。他从小好学，“八岁学通《论语》、《毛诗》。博览坟籍，立身简素”，著述甚丰。他的儿子裴驥也是著名的史学家，曾撰后来被称为《史记》三家注的《史记集解》一书。裴松之领命后，“鸠集传记，增广异闻”，于刘宋元嘉六年（429）将《三国志注》完成。书成奏上，宋文帝非常满意，赞扬说：“此为不朽矣。”

裴松之的注不同于传统的注，重点不在于对语言、名物、制度的考证解释，而在于对史事的补缺、备异、惩妄、论辩。其中补缺、备异，是资料的补充，是对于所引用资料的归纳与整理。惩妄、论辩，则是对于所引用资料的考证与批评。这就是说，他不仅仅是简单的搜集罗列资料，而且要经过校勘考证，提出自己的观点。有学者考证，裴松之引用的书达二百一十种，其中大部分已经亡佚，而他所引史事，大多首尾俱全，未加删节，这就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珍贵的资料。所以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说裴注“转相引据者，反多于陈寿本书焉”。比如关羽、赵云二人传记的简略问题，经裴注得到了很好的解决。《蜀书·关羽传》补充约一千字，其中有关羽喜读《左传》、许田射猎等事。《蜀书·赵云传》补充一千四百余字，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，其中有赵云截江夺阿斗等事。这些大量的极其有用的资料，为后人阅读理解这部史学名著提供了很大的帮助，同时也为后人创作《三国演义》提供了素材。

对于裴松之的注，人们也有非议之词，比较突出的是认为他引用资料过于芜杂烦琐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就说裴松之“往往嗜奇爱博，颇伤芜杂”，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。至于有的学者批评他“注之所载，皆寿之弃余”，就不够客观了，他所引用的资料，大部分出于陈寿同时人或后人的著作，陈寿根本没有见到它们的可能。而有些可能被批评者引以为据的东

西,裴松之的初衷并不全是为补充资料,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史学观点。比如著名的“空城计”的故事,它最早见于西晋郭冲的《诸葛亮五事》,根据史实,是毫无根据的妄说。所以陈寿未予采纳。裴松之虽然引用,但应该是出于惩妄的目的。所以他在引用的同时,对这种说法的荒谬以及悖于史实,都作了批评,认为“此书举引皆虚”。而这些虚妄的材料本身,以后人的眼光来看也不是毫无用处,它被后人加工借用,成为《三国演义》中非常精彩的一个章节。

总之,裴松之的注价值极高,它已经与《三国志》成为一体,读《三国志》必须要读裴注。清代学者钱大昭甚至认为,裴松之依据他所掌握的新材料,完全可以自成一史,是因为他自己谦虚,才附于《三国志》下作为注而存在。

由于具有巨大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,《三国志》不仅在史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,对后世的社会文化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。《三国志》很早就流传到海外,有各种文字的版本,海外有众多的学者在研究《三国志》。大约在元末明初,罗贯中依据《三国志》创作《三国演义》,把作为正史的《三国志》通俗化为小说,它最初的名字就叫作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。书中大多数的人物及故事情节都可以在《三国志》及裴注中找到根据或线索,材料的主要来源就是《三国志》及裴注。由于《三国演义》的推波助澜,三国故事

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，而来源于三国故事的人物、典故、语言等等，更是早已深入到人们的生活当中。各种文艺形式的创作也大量的取材于三国故事，比如作为中国国粹的京剧，甚至专有成套且具相当规模的三国戏。三国故事在日本及东南亚等地广为流传，在西方也有很大的影响。有关三国故事的方方面面早已形成丰富多彩的三国文化，而三国文化的普及反过来也促进了人们对于《三国志》的了解。就社会影响及普及性而言，《三国志》在中国的史书中是绝无仅有的。总体而言，绚丽多姿的三国文化，滥觞于陈寿的《三国志》，而由裴松之的广采博注助扬其波，至《三国演义》的流传，则蔚为大观而成江河了。由此，对于三国文化有兴趣的读者，如果能从其所由来的《三国志》中去追寻人物事件的踪迹及线索，将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。

《三国志》问世以来，除裴松之外，为它作注的代不乏人，尤其是清代的一些大学者，在这方面更是下了很大的功夫。近代以来，卢弼的《三国志集解》是一部集历代研究成果之大成的著作，是非常详尽的注释本。上世纪八十年代由著名学者缪钺先生主编、中华书局出版的《三国志选注》，是一部注释精审的选本。近年以来，有不少注译本问世，也都各具特色。

本书是《三国志》的简明读本，共选取纪传二十三篇。选取的标准是《魏书》、《蜀书》、《吴书》在《三

《三国志》中所占的分量以及人物在历史上的影响及地位,由于篇幅有限,有些纪传作了删选。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参考了前贤的一些成果,在此一并致谢。需要说明的是,本书各纪传的选取未必恰当,注译也肯定会有不少谬误,笔者期待着广大读者的指正。

文 强

2007年3月10日

目 录

魏 书

武帝纪	2
文帝纪	46
董卓传	64
袁绍传	83
吕布传	98
夏侯惇传	107
曹爽传	113
荀攸传	125
张郃传	136
郭淮传	147
邓艾传	157
华佗传	171



蜀 书

先主传	182
诸葛亮传	206
关羽传	226
张飞传	235
庞统传	241
姜维传	250

吴 书

吴主传	262
周瑜传	281
鲁肃传	294
陆逊传	306
诸葛恪传	317

魏 书



武帝纪

《武帝纪》是《三国志》的第一篇，记述的是魏武帝曹操的事迹。陈寿全面而详尽地记述了曹操不平凡的一生。曹操是非常有名的历史人物，他以他的雄才大略，叱咤风云数十年，统一了我国北方，同时也奠定了曹魏王朝的基业。曹操将汉献帝控制在手中后，令由己出，已经“三分天下有其二”，这也是他被后人称为奸雄的原因，但他自己并没有废掉汉帝自立。他的儿子曹丕代汉后，追尊他为武皇帝。曹操是大乱世造就的大英雄，他能在群雄中脱颖而出，成就霸业，是因为他具备成就大事的条件。他目光远大，有治平天下的雄心壮志，有百折不挠的勇气和顽强的毅力，有过人的胆识和谋略，有清醒的头脑和恢弘的气度。他精通兵法，用兵如神，善于发现和使用人才。他壮心不已，一生几乎都在征战之中，直至在征途中去世。曹操又是个文采风流、多才多艺的人。他喜欢读书，在军中三十余年，手不释卷，“昼则讲武策，夜则思经传”。他“登高必赋，及造新诗，被之管弦，皆成乐章”，开创了慷慨悲凉的一代诗风，他的文章清峻整洁，他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作家。他善书法，可与当时的书法名家张芝、张昶相媲美；善围棋，能和当时的高手山子道、王九真一较高低。陈寿说他是“非常之人，超世之杰”，确实不是过誉之词。